

论广州沦陷后香港在中国外贸 中的地位和作用(1938. 11——1941. 12)

张晓辉

内容提要 抗战前期,香港起到了中国争取外援和进行对外贸易主渠道的特殊作用。虽自广州沦陷后,香港的地位有所削弱,但仍广泛地拓展了与珠江口东西两翼的扇状贸易运输网络,开辟了通过越南与中国内地的曲线贸易,并继续保持着与上海“孤岛”及华北重要通商口岸的联系。作为远东最大的自由转口港,香港成为中国、英美等国对日本进行经贸较量的重要场所,它在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最艰难的时期内,有助于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了抗战阵营。同时,日本也利用香港自由港大肆走私,产生了负面作用。

关键词 中港贸易网络 越南中转曲线 支持持久抗战

自广州、武汉沦陷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最艰难的时期。

1938年10月,日本攻陷中国沿海最后一个大城市——广州,从而切断了抗战爆发以来作为中国外贸枢纽的“省港通道”。此后几年间,日本继续加紧实行封锁绞杀,妄图切断中国的外援及外贸之路。但其阴谋却难以得逞,其中原因,除了中国军民(包括港澳爱国同胞)的顽强抗争,华南沿海海岸曲折、河汊纷歧、地形极为复杂外,还因占据香港、澳门、广州湾及上海“孤岛”的西方列强“援华制日”,使日军无法阻止第三国(特别是英美)的船只往来,故香港继续保持着在中国外贸中的重要地位,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为止。

一 香港与珠江口东西两翼扇状贸易网络

日军攻占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后,运输大动脉广九铁路中断,中国向英美等国订购运抵香港的各种物品,在货仓里堆积如山。中央政府“电飭留港办理人员,迅将寄存于港中之各种物品,转道运输返国。各专员奉命后,即开始规划,审查品物之先后急需,设法次第转运”。^①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对外贸易转移阵地,分别群集于汕头、澳门、广州湾三大吐纳港,故“此三港之对香港贸易,遂转趋繁荣”。^②特别是香港通过澳门及广州湾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大见增进,如表所示:

单位:港币万元

| 项 目 | 年 份 | 1938. 1- 8 | 1939. 1- 8 | 1939 年比上年增加 |
|-------------|-----|------------|------------|-------------|
| 国产经澳门入香港价值 | | 720. 3 | 1991. 9 | 1217. 6 |
| 由香港入澳门货品价值 | | 1431. 4 | 2810. 0 | 1378. 6 |
| 国产经广州湾入香港价值 | | 510. 0 | 1555. 1 | 1045. 1 |
| 由香港入广州湾货品价值 | | 556. 6 | 2591. 7 | 2035. 3 |

资料来源:《经济新闻》,载 1939 年 9 月 28 日《星岛日报》。

经汕头运至香港者,以果品、茶叶、油类为大宗;由澳门运至香港者,以鱼类、蔬菜、土布、生丝及丝织品、矿砂、烟草等为大宗;由广州湾输入香港者,以牲口、粮食、桐油、财宝等为大宗。反过来,由香港经澳门运入内地者,则以粮食(谷米、面粉)、煤油、花生油、卷烟等为大宗;由香港经汕头、广州湾两地运入者,以煤油为大宗,

① 《港闻》,载 1938 年 11 月 6 日《星岛日报》。

② 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广东经济年鉴》,第 4 章经济历史,1940 年版,第 89 页。

其次为匹头、车辆。^①

据拱北海关报告：自广州沦陷后，“大批货物乃自香港运往澳门，然后假手民船、舢板及汽车转运内地”。由于内地“秩序机隍，各种土货向经由粤海、九龙两关运往外洋者，兹多假道本埠（指拱北）运输出口”。因此，1939 年拱北关“对外进出贸易不特未至中断，且较往年反见优胜”。据该海关统计：本年进口洋货共值国币 2660 万元（上年为 370 万元）；直接出口土货价值国币 2010 万元（上年为 700 万元），可谓“激增倍蓰”。^②

1939 年 6 月，粤东汕头失陷，该埠的进出口贸易逐年显著下降。如表所示：

| 年度 | 汕头口岸进出口贸易统计(单位: 国币元) | | | 汕头港船舶进出口艘数及吨位表 | |
|------|----------------------|----------|----------|----------------|---------|
| | 进口 | 出口 | 合计 | 艘数 | 吨位 |
| 1937 | 36296919 | 33514706 | 69811625 | 1833 | 2973000 |
| 1938 | 36588534 | 37553020 | 74141554 | 1370 | 2225000 |
| 1939 | 33435483 | 34249531 | 67685014 | 366 | 1245000 |
| 1940 | 553105 | 233711 | 786816 | | |
| 1941 | 48434 | 651 | 49085 | | |

汕头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编：《汕头外经贸志》，1993 年编印，第 249、266 页表。汕头口岸进出口贸易绝大部分是与香港进行的，故引此表以作参考。

原汕头口岸对外贸易被迫转移至饶平的柘林、澄海的东陇、潮阳的海门、惠来的神泉及靖海、陆丰的甲子等沿海港口，以小汽船、木帆船继续坚持对香港线的贸易运输。

这年 11 月，日军由钦县进窥广西，截断北海与香港的交通，原

① 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广东经济年鉴》，第 4 章经济历史，1940 年版，第 89 页。

② 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基金会 1998 年版，第 383、385 页。

行驶于两地之间的 2 只轮船(分属于太古、怡和轮船公司)被迫停航^①, 香港与华南西部沿海地区的贸易联系也遭到挤压。

1940 年 5 月, 日军占据拱北海关各支关, 该关即停止征税。自广州、江门、中山等地被占后, 澳门“即变为沦陷区与后方交换物资之最大中心区”。^②

虽然华南沿海重要城市相继陷于敌手, 但内地货运尚能与香港保持经常接触。1939 年末, 第一次粤北大捷后, 广东战局趋于稳定, 以惠州、淡水和西江南路为主的東西两翼与香港的贸易十分活跃, 广州沦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快即淡化。中国政府开放惠阳至大亚湾畔沙鱼涌的门户与香港通商, 这是第四战区“现存最重要之国际交通线”。^③ 大量物资运入内地, 粤战时省会曲江一跃而成为物资集散中心。

1940 年, 广东政府动员东江失业苦力, 兴筑龙川至河源、惠州, 淡水至沙鱼涌的交通线。8 月, 省府会议决定设立驿运管理处曲江至沙鱼涌各段站, 以加强对运输的管理。^④ 同时, 国民党第四战区经济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关于利用人力物力及简单运输工具以增强运输力量、利用木炭汽车运输以节约汽油的主张, 得到四联总处和国民政府行政院充分肯定。^⑤ 港韶线商运颇为发达, 由龙川老隆至韶关的运输公司纷纷成立, 拥有新式汽车 300 辆, 连同广

① 《港闻》, 载 1939 年 11 月 21 日《星岛日报》。

② 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 第 388 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2 编财政经济(五),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496 页。

④ 广东省档案馆编:《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6)》, 1988 年编印, 第 101 页。

⑤ 重庆档案馆等编:《四联总处史料(上)》, 档案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58 页表。

东省银行贸易部等机构的车辆共达上千辆。^① 虽然常有敌机空袭,但港韶线贸易仍很兴旺。港商经营该线的运输公司达 50 余家,来往于香港和沙鱼涌的货轮有 12 艘,帆船、木船、趸船等 70 余艘,由香港往东江担任押货员及挑夫者达 500 多人。^②

在珠江口西岸,西江南岸交通线货运蓬勃,在各运输线上行商川流不息。三埠(即开平之长沙,台山之荻海、新昌,潭江穿镇而过,三埠鼎立,素有“小武汉”之称。以三埠镇为中心,水、陆交通向四面延伸,故又有“四邑咽喉”、“四邑锁钥”之誉)成为西江与南路交通之总枢纽,货物可由此转台山广海直通香港长洲。^③

由于港粤间贸易依然畅通,故其作用仍不可忽视。如表所示:

广东会战前后外贸进出口统计表单位: 国币千元

| 年份 | 广东土货出口 | | | 广东洋货进口 | | |
|------|--------|--------|------|--------|--------|------|
| | 出口总值 | 香港部分 | 香港占% | 进口总值 | 香港部分 | 香港占% |
| 1938 | 199089 | 126427 | 63 | 253303 | | |
| 1939 | 104733 | 57997 | 55 | 93305 | 15550 | 16 |
| 1940 | 113376 | 42121 | 37 | 221880 | 108169 | 48 |

制表依据:《广东省银行季刊》第 3 卷第 2 期,第 439—446 页,1943 年 6 月。其中,洋货进口值原为海关金单位,均已分别按当年海关金同国币的比值换算为国币。

据《广东经济年鉴》记载:1940 年广东经香港出口国外的土货,主要有海草席、地席、竹器、甘蔗、海草绳、鸭毛、鹅毛、生丝、废丝、绸缎等。这年广东出产生丝 2.4 万包,运往印度、美国约 1.8

① 《华南要闻》,载 1941 年 1 月 18 日《星岛日报》。

② 《华南要闻》,载 1941 年 2 月 9 日《星岛日报》。

③ 《华南要闻》,载 1940 年 12 月 4 日《星岛日报》。

万包,余 6000 包虽在香港销售,但多转往越南。^①

日本自战争之初宣告封锁中国全部海岸,所有中国领海一律严禁中方船舶航行。但经过几年的“切断作战”证明,在漫长的海岸线上,仍有许多空档可向内地输送物资,经济封锁并未奏效。特别是以香港为基地输入的物资数量较大,而由香港经水路在沙鱼涌卸货,再由陆路通向广东战时省会曲江的运输尤为活跃。因此,日本于 1941 年初对华南沿海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封锁战”。

日本进攻的首要目标是香港东面的淡水一带。1941 年 2 月 4 日,日本华南方面军登陆澳头,攻占沙鱼涌,截获大量准备运入内地的物资。此次军事行动完全封锁了大鹏湾和大亚湾,并切断了香港至曲江的运输线。日军还增兵沙头角,严密封锁中英边界,禁止通行。^②此后几月内,日军又在广东东、西两翼发动了一系列进攻,并从 5 月 12 日起封锁港澳沿海,使粤港间的商运日趋不便。^③

日本发动“封锁战”,付出了重大代价,虽然迫使粤港运输收缩或改道,但仍未能达到彻底割断交通之目的。香港至曲江的重要通道被切断后,香港货物仍能大批转道由四邑三埠及广州湾经遂溪而流入华南内地。^④特别是广州湾,因与香港间货运十分方便,成为港粤交流物资主要的驳运站。1941 年 7 月,四联总处文件指出:“供应集于一隅,流畅达于各省”,每月经广州湾内运货物总值约 2700 万国币元。^⑤

此时,由于运输货物的零散和贸易路线的多头及隐蔽性,粤港

① 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广东经济年鉴》,第 4 章经济历史,1940 年版,第 89 页。

② 《华南要闻》,载 1941 年 2 月 9 日《星岛日报》。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02 页。

④ 丘斌存:《广东直接税之动态》,载《广东省银行季刊》第 3 卷第 2 期,1943 年 6 月。

⑤ 重庆档案馆等编:《四联总处史料(下)》,第 39-40 页。

贸易的数额已难以统计,但进出口货物品类仍很繁多。据 1941 年对粤省各县市经济的调查报告,进口货主要有棉纱、布匹、面粉、西药、煤油、汽油、颜料、豆饼、肥料、火柴、纸烟、洋糖等类;出口货则多为矿砂、麻、蒲席、花生油、红糖等。^①

二 香港—越南—中国内地贸易曲线

越南是香港最重要的货物输出地之一。1937 年,越南对香港输出货值为 2.95 亿法郎,占该国出口总额的 11.4%;从香港输入货值 1.35 亿法郎,占其进口总额的 8.6%。进出口比例均仅次于法国及其属地而居第二位。^② 1938 年,越南对香港输出 2.74 亿法郎,从香港输入 1.43 亿法郎,分别居于该国对外贸易国家或地区出口的第三位和进口的第二位。^③ 广州沦陷后,法国殖民当局“迭次宣布禁止军用品经由该属地转运,甚至一切车辆胶轮,凡被指为用诸军事者,亦在禁运之列”,连“救护车亦不能例外”。此时由海外运抵香港,准备转入内地的各种车辆数量极多,因扼于禁例而不能起运,于是中国政府派出专员前往越南交涉。^④ 此外,华南事变后,香港商业遭到很大损失,时人乃有“上海失守而香港骤盛,广州失守而香港又骤衰”之虑。^⑤ 为打破僵局,港商亦寻求新的贸易线,即“贯联港越企求合作”,其基本考虑为:密切两方之联系,将过去省港关系,移于港越之间,以后内地出口各种货品,转运输出,可

① 《广东省各县市经济情况调查汇报》,载《广东省银行季刊》第 1 卷第 4 期,1941 年 12 月。

② [日]大形太郎:《南方经济の进路》,日本高山书院昭和 17 年版,第 188 页表。

③ [日]名古屋市临时东亚调查部编:《南方经济事情》,昭和 17 年发行,第 300 页表。

④ 《港闻》,载 1938 年 11 月 21 日《星岛日报》。

⑤ 《港闻》,载 1938 年 10 月 24 日《星岛日报》。

由滇越铁路、公路输往海防,再用船舶转运至香港,再由香港驳载各欧美大轮船,运往西方及南洋各地市场;而欧美各国输华物品,可运至香港,然后转轮船赴越,由陆路交通线运入中国内陆。

南北行一部分行商,已开始规划此设想,第一步先将创设分店于海防,作为货运来往之中站,各行商多已选派专员,前往海防作调查和选点;各南洋办庄等,亦采取同样步骤,从中规划;而银业界更有具体行动。^① 经过种种努力,虽然失去了广州,但香港仍保持了战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大量中国货物改由昆明经滇越铁路输往海防,再转运至香港出口;或由四川经贵阳、桂林运至广州湾,再转香港外销(当然,也有直接从海防、广州湾迳运海外者)。^② 1939年第一季度,香港输往越南货值为近1563万港元,从越南输入的货值为近955.6万港元。^③ 1940年,越南局势由于日本的强烈干扰而变幻无常,使港越之间的货运大受影响。

三 香港与上海及中国北方重要口岸的贸易

上海“孤岛”时期,出口贸易较前有很大变化,即对欧美(尤其是西欧)各国的出口比重逐年缩小,对南洋地区和香港的出口比重逐年上升。在此期间,上海口岸贸易总值中输往南洋及香港部分所占的比重,如下表所示:

| 输往国别 | 各年占上海出口总值的百分比 % | | | | |
|------|-----------------|-------|-------|-------|-------|
| | 1937 | 1938 | 1939 | 1940 | 1941 |
| 南洋地区 | 4.88 | 10.97 | 14.11 | 14.78 | 26.27 |

① 《港商寻求新贸易线》,载1938年11月21日《星岛日报》。

② 《经济新闻》,载1939年2月6日《星岛日报》。

③ 引自《贸易调查·半年来的港越贸易》,载1946年7月23日香港《华商报》。

| | | | | | |
|-------|-------|-------|-------|-------|-------|
| 香港 | 6.72 | 17.64 | 15.63 | 15.26 | 18.69 |
| 两地区合计 | 11.60 | 28.62 | 29.74 | 30.04 | 44.96 |

摘自《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表。

1938至1941年间,可以说“孤岛”轻工业制品的出口“旺势空前”,上海租界的华商通过香港与内地沟通贸易。1938年上海对香港出口额为国币3934.3万元,翌年即达6076.3万元。而同期上海从香港的年进口额却只有200多万元。沪货激增的主要是生活资料及金属制品等,后者对于内地经济建设有更大的利用价值。日本认为上海对香港输出的增加,“表示出经由此地对河内、云南贸易路线的旺盛,因此上海租界的商势,通过与香港的交易而作为重庆辖下的物资供给据点而繁盛”。^①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与香港有着传统的贸易关系。1939年,天津港从香港进口的棉花及棉织品、纤维及纤维制品、机械、车船、金属、食料品、药材、香料、油脂、化学制品等共值161.1万金单位,占当年该港进口总额的1.14%。^②1938至1941年间,香港在天津进口贸易额中所占比重变化不大,但在天津出口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却逐年上升。如表所示:

香港在天津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表

| 年份 | 1938 | 1939 | 1940 | 1941 |
|-----|------|------|------|------|
| 进口% | 1.26 | 1.14 | 2.65 | 1.12 |
| 出口% | 3.25 | 7.24 | 8.27 | 9.65 |

摘自《天津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表。

香港与山东沿海烟台、青岛、威海及龙口等重要商埠也保持着

① [日]满铁调查部编:《支那经济年报》,日本改造社昭和15年版,第366页。

② 中国水运丛书:《天津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页表。

密切的贸易来往,其特点是:1938至1941年间,香港对山东各口岸的输出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山东主要口岸对香港的输出则呈现上升的趋势。但从总的来讲,香港在山东各口岸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变得非常微小。如表所示:

香港与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表(1937—1941年)

币值单位:香港对内地输出为海关金单位;内地对香港输出为国币元。

| 年份 | 1937 | 1938 | 1939 | 1940 | 1941 |
|--------|---------|---------|--------|---------|---------|
| 香港输往烟台 | 64533 | 525048 | 371420 | 101584 | 24739 |
| 烟台输往香港 | 3619820 | 4203646 | 233470 | 635565 | 827169 |
| 香港输往青岛 | 286865 | 101668 | 269551 | 2540667 | 1189764 |
| 青岛输往香港 | 2023212 | 172800 | 10554 | 1658107 | 2890798 |
| 香港输往龙口 | 858 | 62 | 28085 | 1236 | 7 |
| 龙口输往香港 | 1830447 | 1631770 | 77605 | — | — |
| 香港输往威海 | 13984 | 37614 | 5521 | 4711 | 196 |
| 威海输往香港 | 357527 | 288576 | 6868 | 706 | — |

根据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859—1949)》,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0页表整理。

香港占山东通商口岸贸易总额比重表(1937—1941)%

| 年份 | 1937 | 1938 | 1939 | 1940 | 1941 |
|----------------|------|------|------|------|------|
| 香港占各国对烟台输入额的比重 | 2.6 | 13.9 | 5.1 | 2.0 | 0.5 |
| 香港占烟台对各国输出额的比重 | 30.9 | 32.9 | 2.6 | 5.5 | 7.9 |
| 香港占各国对青岛输入额的比重 | 1.4 | 0.5 | 0.7 | 3.4 | 1.6 |
| 香港占青岛对各国输出额的比重 | 3.7 | 0.7 | 0 | 1.8 | 3.6 |
| 香港占各国对龙口输入额的比重 | 0.1 | 0.7 | 7.6 | 0.2 | 0 |
| 香港占龙口对各国输出额的比重 | 87.9 | 99.8 | 93.7 | — | — |
| 香港占各国对威海输入额的比重 | 4.9 | 10.3 | 1.3 | 1.4 | 0 |
| 香港占威海对各国输出额的比重 | 14.6 | 23.6 | 0.5 | 0 | — |

根据《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859—1949)》第36—50页表计算。

宁波外贸对象以香港为主,输出量增长很快,货品主要是被中国政府统制的茶叶。^①

四 本时期内香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香港与华南的正式交通路线被切断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香港仍发挥着中国战时对外贸易主渠道的特殊作用。

(一) 香港是国统区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均在香港设立网点,如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驻香港机构、四联总处香港分处、香港中国银行团、中美英汇兑基金平衡委员会香港办事处、广东省战时贸易管理处香港办事处等,这些机构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竭力奖励土货,增加产量,扩大外销市场。并会同中国植物油公司、中央信托局、中国茶叶公司等,收购全国重要外销土货,集中香港出口,准予免税,故办理颇有成效。^② 中国战时贸易特别是官方出口贸易完全经由贸易委员会之手进行,其经营货物包括桐油、茶叶、猪鬃、生丝、羊毛、苧麻、肠衣、各种动物皮等,业务繁多,范围极为广泛。作为输出业务的实际负责机构,贸易委员会下设富华贸易公司(总公司在香港),以利统制战时贸易。^③ 日本分析香港的重要战略贸易地位,认为随着中国事变的发展,英国不得不从华北、华中退却,香港逐渐成为对日经济战的前沿阵地。它作为英美对日封锁、对蒋(介石)援助的据点,愈加意义深远。美英中经济会议多次在香港举行,三国为维持法币而成立的汇兑平衡资金委员会的本部也在此。英美还支

① [日]满铁调查部编:《支那经济年报》,日本改造社昭和15年版,第358页。

② 《港闻》,载1939年2月10日《星岛日报》。

③ [日]满铁调查部编:《支那经济年报》,日本改造社昭和15年版,第520页。

持香港与内地国统区的秘密贸易,使蒋政权能通过香港维持战时财政。故对于重庆方面来说,“香港真正是抗战经济的中心”。^①

(二)中港贸易网络有利于国内战时物资的抢运及转运。如战时盐斤抢运尤为重要,粤盐外运,在东区各场系由汕韶督运处负责推动,主要运道分陆、海两路,其中海运线为先输运至香港,再设法辗转外运。主要渠道有4条,即:一由香港运至澳门,再转至三埠、四会、清远等地,循北江而抵韶关;二由香港至阳江、阳春,循北江而达韶关或循西江而转入广西;三由香港至广州湾,经粤西转入桂线;四由香港经越南海防转入广西。^②这些通道迂回曲折,水陆更番,接运备极艰辛,直至1941年后,有的仍在坚持运行。

战时因敌人封锁,加以内地荒欠严重,自1939年冬起,各地粮价暴涨,形式极为严峻。而香港存米通过粤港贸易线源源运入,对于日益严重的内地米荒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③1940年后,洋米运输线变动频繁,只能用民船相机偷运,主要仍来源于香港。^④

自日本封锁中国海岸线后,大量物资除经越南铁路和滇缅公路运输外,凡急需物资,业已逐渐由香港经渝、桂航空线运至国内。及日军占领越南,滇越铁路无法再内运,滇缅公路亦因日本压迫而暂停3个月时,外来物资全赖空运入境。为适应这种紧急情势,欧亚、中国航空公司特于广东南雄与香港之间,开设航线,利用其航程短近,多开航班,专运物资进口,收效甚宏。直至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欧亚二航空公司所营南雄至香港线,不数日后即告停航。^⑤

① [日]秀岛达雄:《香港·海南岛の建设》,东京松山房昭和17年版,第116页。

② 《广东年鉴》,1941年版,第22编盐政第2章粤盐纪实。

③ 《战时广东粮食价格之分析》,载《广东省银行季刊》第1卷第4期,1941年12月。

④ 《广东年鉴》,1941年版,第21编粮政第4章业务处理。

⑤ 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58、263页。

(三) 中港贸易输出大量国产品, 为中国政府赚取了宝贵的外汇, 同时又得以购进急需的军事战略物资, 对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支援持久抗战,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据官方统计: 1939 年, 国产输往香港价值为 97829605 港元(伸合国币 359034650 元), 约占当年香港进口总值的 16.46%; 1940 年, 国产输往香港价值为 86726828 港元(伸合国币 318287458 元), 约占当年香港进口总值的 11.51%。1939 年国货已由香港出口外销者总值 129806093 港元(伸合国币 476388361 元), 约占当年香港出口总值的 24.35%; 1940 年国货已由香港出口外销者总值 108315900 港元(伸合国币 397519353 元), 约占当年香港出口总值的 17.41%。^① 当时资料纪录表明: 中国每年对香港的贸易额绝对值均高于战前的水平。在各国对香港贸易中, 以来自中国的贸易额居首位。^②

在物资进口方面, 国民政府修订进口关税, 促进必需品输入。抗战之初, 决定凡属与军事相关的物资尽量减免关税, 以促进其输入。1939 年 9 月, 再次订定进口必需品减税办法, 规定凡属外国物资未经订入政府所颁进口物品品目表以内者, 准由商人按照 1934 年进口税则原定税率, 减免 2/3 税额, 报运进口。^③ 据此无论官民都踊跃从香港输入物资。据笔者粗略统计, 1939 年 2 月至 1941 年 7 月, 仅在广东省政府会议有记录(多为密件)的下属各部门在香港采购各类物资即达 21 次, 最多为通讯器材、米谷、面粉、药品、电油, 以及电机、仪器设备、消防器材、电单车、电线、电池等,

① 根据 1941 年 2 月 10 日《星岛日报》所载《经济新闻》资料整理计算。

② 《经济新闻》, 载 1940 年 5 月 20 日《星岛日报》。

③ 崔国华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00 页。

价值庞大。^① 有关当局文件还记载：“省府各厅及省属机关在港购物多经(广州)湾转运”。^② 从香港进入华南的物资有不少是转往大后方的，如数批散赈美麦内运均照此办理。^③ 1939年2月至1941年6月，中美签订了4次易货借款，中英签订了2次信用借款，可购买各种急需物品，其中不少是利用香港输入的。中央银行口岸汇款七八成是购买战时用品，解款最多之处为香港，1940年达3600余万国币元，上海次之，为1530余万元。^④ 1941年，香港中国银行团集资购买洋米运销内地，广东省粮食管理局还支持成立了香港各属同乡旅港购运粮食委员会和本省各口岸舶来粮食管理站。同时粮食部亦“设法奖励洋米输入以资接济，并由中央拨付粤省2000万元以作购运”。^⑤

本来国民政府为防止资金逃避维护外汇市场，对口岸汇款除党政军及“国营”事业机关必要汇款核明承汇者外，限制特严。但1940年后，中国经济进入困难阶段，农业歉收，物价猛涨，通胀严重，外贸及国外物资供应日减，国家财政更为拮据。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经济问题上到了重要地位。鉴于后方各地所需机器原料和日用必需物资，大部分仍须由口岸内运，口岸汇款之需要始终未减，四行总处于1941年提议开放港沪商业汇款，并决定“以便利后方商民为主要对象，售出外汇购运货物，以能运入后方者为原

① 参见广东省档案馆编：《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5、6、7)，1988年编印。

② 广东省档案馆编：《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6)，第44页。

③ 广东省档案馆编：《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7)，第31、189、236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三)，第307页。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九)，第340页。

则”。平准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光甫复函云：“兹为鼓励上海或其他任何地方之物资内运前往自由中国，以调整上海与后方各地间之法币差价，并谋改善中国之经济情形起见，应由本会筹议种种办法，期与中中交农四行切实合作……今后尤宜加倍努力，增加中国物资供给”。^① 据四联总处的报告，1941 年下半年重庆 14 家商业银行共汇往沪港国币 7695 万余元，其中香港为 821 万余元；由沪港汇入 6079 万余元，其中香港为 2228 万元。同期后方各地官方四行承汇港沪款项共计 5297.5 万元，其中香港为 3351 万余元。^②

在物资出口方面，国民政府修订出口税则，鼓励非必需品输出。如 1938 年春，规定 24 种出口物资，一律须先向当地政府交付出口外汇后方可出运。1939 年又把上述结汇物资品目加以修订，颁布《出口结售外汇办法》，其中的桐油、茶叶、猪鬃、矿砂等改由政府统购统销，不准商人自由营运，以后又把羊毛、生丝也列为统购统销货物。^③ 中国法币的低落，反而有利于土特产品的输出，并与国民政府出口奖励政策相对应。故尽管日本实行经济封锁，但中国主要土产如桐油、茶叶、猪鬃、蚕丝、矿砂等，仍能源源运往香港集中外销。如表所示：

中国土产经香港外销表(1938—1940 年)单位：港币万元

| 年份 | 桐油 | 茶叶 | 矿砂 | 猪鬃 | 蚕丝 | 其他 |
|------|------|------|------|-----|-----|----|
| 1938 | 3974 | 1608 | 1639 | 430 | 419 | 略 |
| 1939 | 5068 | 1228 | 2022 | 614 | 838 | 略 |
| 1940 | 5087 | 2183 | 195 | 763 | 444 | 略 |

制表依据：《经济新闻》，载 1941 年 2 月 10 日《星岛日报》。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以曲江为粤北及湘赣土产运销出口之孔

① 重庆档案馆等编：《四行总处史料(下)》，第 38 页。

② 重庆档案馆等编：《四行总处史料(下)》，第 74 页。

③ 崔国华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第 101 页。

道,为集中战时出口外汇起见,曾派外汇管理员詹信善驻韶关,主持管汇事宜。他在1940年3月下旬答记者问时云:自实施管理出口外汇后,进行顺利。唯中行韶关分行奉总行命责成出口商先缴全部应结外汇,始准签盖承购外汇证明书,手续繁琐,出口商感到不便。现为促进贸易起见,特与中行韶关分行分呈贸易委员会及中行总行,另筹妥密办法。至于出口商在香港有联号者,近来多已去电先交应结港币,再在韶关领取承购外汇证明书,凭报海关放行。^①为了便于管理,鼓励出口,财政部于3月15日实施《修正全国出口货物结汇报运办法》,要点在于“发展西南对外贸易,改善出口货结汇办法”。指定蛋品、羽毛、肠衣、皮革、五倍子、药材、麝香、油脂、子仁、烟草、木材、蚕丝、棉花、苧麻等14类,为应结汇出口货,其余货物,除政府统销的桐油、茶叶、猪鬃、矿产外,概予免结外汇;清结外汇数额时,准西南各省货物照实售货价7成结算(全国为8成),因其货物外汇运销较多;办理手续费用亦予以减缩。^②

出口结汇政策使国民政府赚得巨额外汇,根据中国银行年度业务报告,1939年度按银行牌价结进港币92.4万余元,1940年度为373.9万余元,1941年度(截至11月底止)近1639万元,增幅大且远远高出英镑、美金及越币的款额。^③战时广东财政亦因对港贸易而得益非浅。如1939年广东对香港的贸易顺差高达4200多万国币元(当年该省外贸出超额为1200多万国币元,打破历年来外贸入超之局面),其主要原因即在于:粤府奖励出口贸易,并限制进口货物的报运,因当时日轮在广东各沦陷口岸进出,根本不受

① 《华南要闻》,载1940年3月29日《星岛日报》。

② 参见崔国华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第337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三),第477、490页;重庆档案馆等编:《四联总处史料(下)》,第160-161页。

海关检查, 所载日货大都走私倾销内地; 欧战爆发, 西方列强无暇东顾, 而中国传统的大宗出口货物如桐油、茶叶、药材等分别以美、苏、南洋华侨为主顾, 多半不受欧战的影响。^①

另外, 战时内地各省都赴粤港采购物资, 广东政府遂在粤北等交通要道课征货物过境税, 收益颇丰。如广州失陷后, 粤省税源短绌, 1939 年岁入顿减至 1320 万国币元。而 1940 年即复原, 翌年突增至 1.6 亿元, 超过该省历年岁入之纪录。^② 由于舶来物品多从香港运入, 财政当局又在宝安置税务局(为一等一级局) 并设香港办事处, 这是当时最能获得大宗税收的局所。^③ “舶来物产专税” 是重要的财源, 其收入逐年猛增, 1939 年为 684 万国币元, 1940 年为 2500 万元, 1941 年增至 5600 万元, 竟成为广东战时财政的主要支柱。^④

不过, 当 1941 年国际交通线路变更后, 国产难以再运港集中外销, 大多假缅甸仰光出口。这年首季, 桐油、生丝钨锡矿砂、茶叶、猪鬃等 5 种重要货品, 运香港集中出口者, 价值仅 621.8 万元, 较上年同期骤减 3358 万元。^⑤

(四) 香港与北方各埠(特别是沦陷区) 贸易的作用比较复杂, 带来两重性的后果。但主要方面对抗战有利, 因为中国政府需从各地吸收和抢运物资, 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如前所述, 北方各埠与香港贸易的基本格局是出口远甚于进口, 这些口岸的海关大都还控制在英美等国之手, 而且上海、天津等埠还有英美租界, 故贸易还是必要的。据四联总处史料, 直至 1941 年, 其还通过香港

① 《广东战时贸易透视》，1940 年 8 月 23 日《星岛日报》。

② 《广东年鉴》，1941 年版，第 8 编财政第 2 章岁入。

③ 广东省档案馆编：《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6），第 308 页。

④ 《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未刊稿，第 247、251 页。

⑤ 《经济新闻》，载 1941 年 5 月 12 日《星岛日报》。

向沪津转汇款项(因天津解款困难,须托外商银行转汇)。^①又如华南沿海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汕头沦陷后,与香港之间的正常贸易额剧减,对日伪统治区明显不利。由下表可见,1938至1940年间,粤海关贸易值及其征收的各项税钞均大幅度地下降。

粤海关进出口货值及其征收各项税钞表(1937—1941) 单位:国币元

| 年份 | 由外洋进口 | 往外洋出口 | 进口税钞 | 出口税钞 | 其他税钞 | 税钞共计 |
|------|----------|-----------|----------|---------|------|----------|
| 1937 | 45166170 | 63845966 | 7865397 | 2127945 | 略 | 12851063 |
| 1938 | 56945897 | 106693552 | 9665395 | 3691287 | 略 | 19547659 |
| 1939 | 3943777 | 5321565 | 671840 | 47976 | 略 | 867149 |
| 1940 | 14302747 | 15564418 | 5625802 | 237971 | 略 | 6704622 |
| 1941 | 43041793 | 82230415 | 15656563 | 2072143 | 略 | 20820780 |

根据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委会、广州海关编委会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1、1149页整理。

关于汕头的情况亦大致如此(可参见本文前表)。就全国沦陷区口岸的情况来看,香港在其进口货中所占比重已很小。如表所示:

| 年份 | 1938 | 1939 | 1940 | 1941 |
|---------|------|------|------|------|
| 香港所占比重% | 1.8 | 1.4 | 2.2 | 1.8 |

摘自《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下册,第50页表。

当然,既然是贸易,就不可能仅单方得利,正如国民政府两次平准基金的运用,稳定了法币的汇率,英美等国得到很大好处,但日本竟也有收益。^②另外也应看到,日本利用香港作为走私基地,也使香港在战时中外贸易关系中起了负面作用。抗战爆发后,日本侵占了中国沿海富庶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业产品的极端匮乏

① 重庆档案馆等编:《四联总处史料(下)》,第48—49页。

② 参见崔国华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第348页。

和日军掠夺原料实行“以战养战”的阴谋,成为促进两个区域黑市交易的媒介,而走私活动则起到从中沟通的作用。尤其在华南地区,香港仍是走私问题的焦点。

日本利用香港来获取中国内地资源,是战时走私猖獗的最重要原因。如日本在香港收购牛皮,使之价格由战前每斤三四十港元飞涨至 90 余港元。故 1937 年 11 月后,国内各地皮革纷纷运港销售。^① 1939 年,日本占领粤省产丝区顺德等地后,实行“警备”,但凡丝、绸概由三井、三菱洋行等日商统制收购,每担生丝发价 650 元军用票(日军在沦陷区强制使用的纸币,信用极低),运至香港市场后,销售价高达 1200 余港元。^② 1941 年,普宁的桐油辗转销往香港,每百斤可获利 750 港元。^③ 在潮汕,“随着奸商的活动,是走私的深入,敌人通过他们在我们的后方和广大的乡村,拼命收买铜仙、麻皮以及矿铁锡等军用原料……载到汕头,运载到香港去了”。^④ 日商还在香港专设机关收购铜元,直至 1940 年间,香港对铜元的吸收都极为严重,私枭竟公开包裹铜元运往香港。^⑤

钨砂是重要的军事工业原料,抗战初期,粤桂各地所产钨砂运至香港,中国政府严厉缉捕仍不能遏止。香港成为钨砂出口汇集处,以中山、澳门运来者最多,其次是潮汕、惠阳、梧州等处。偷运者组织严密,其载运出口及接收,均有接应。钨砂内地价格与香港收购价格相差极大,日商即以此利诱不法之徒。^⑥ 1940 年后,东江

① 《各地金融经济报告》,载《中行月刊》第 16 卷第 5 期,1938 年 5 月。

② 《华南要闻》,载 1939 年 6 月 16 日《星岛日报》。

③ 《广东省银行季刊》第 1 卷第 4 期,第 344 页。1941 年 12 月。

④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42,中央档案馆、广东档案馆 1982 年编印,第 499 页。

⑤ 《华南要闻》,载 1940 年 3 月 2 日《星岛日报》。

⑥ 《本埠新闻》,载 1937 年 10 月 27 日《香港工商日报》。

一带私枭甚为猖獗,偷运巨量钨砂到香港销售。据报道,当时仅东江私钨运港每月即达 1300 余吨。每担在当地收购价仅 60 国币元,运到香港后最高可售约 270 港元。故私枭作大规模之经营,并以武装护运。^① 据报道,1940 年 3 至 4 月,由香港转售予日本的钨砂即达 8073 担,价值为 188 万余港元。^②

日本的侵略和破坏,使战时中国政府及海关的缉私能力被严重削弱。各地政府吏治不良,无法有效遏制走私活动,故私枭能经常把内地紧控物资输出,又将日货运入。越是接近沦陷区,缉私税务机关问题越多,以致大规模走私贩私竟成为内地与香港贸易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鉴于港澳边界私枭猖獗,1939 年初,九龙海关曾增强缉私力量,扩编辑私队伍并配置新式武器。^③ 尽管如此,其收效实在有限。在香港通往内地的漫长衔接地带,海盜、私枭、税警、地方官员往往是几位一体,利用夜幕的掩护和处于交通线上的“地下通道”,为非作歹。1940 年,美国记者格兰姆·贝克在从港澳至西江的转移过程中,曾多次亲历此境,在其著作《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一书中,详尽地披露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犯罪事实。

此外,日本不断发动军事行动,也严重地破坏了中国政府的缉私能力,助长了私枭的活跃。如广州、汕头等城市沦陷后,中山海岸私枭活跃起来。由于日本机舰骚扰,且中山亦一度沦陷,原各海关关卡及缉私机构都大受打击,故私枭乘机活动。其大都是从宝安、深圳、后海等处转过来,在澳门设办庄,每日从香港购入大批日货,伺机偷运入内地。拥有走私快艇 10 余艘,月运私货已由百余

① 《华南要闻》,载 1940 年 3 月 4 日《星岛日报》。

② 《广东战时贸易透视》,载 1940 年 8 月 23 日《星岛日报》。

③ 《华南要闻》,载 1939 年 2 月 11 日《星岛日报》。

万港元增至 200 多万港元。^① 在日伪统治下, 广州成为敌进行走私活动的一个聚散中心。参加走私网的有日本浪人、军人、汉奸、奸商、豪绅, 国民党政府中的许多官僚、军人等。战时港粤走私进口的路线, 主要有香港至广州; 香港至澳门, 再由澳门至广州或内地; 香港至潮汕等 3 条。走私货品以卷烟、卷烟纸、颜料、面粉、奶粉、罐头食品、糖精、火油、药材、化妆品、毛织品、人造丝织品、棉纱、棉织品等为大宗。走私出口的路线, 主要有广州经大塘、太平至香港; 广州经增城至香港; 广州至新塘, 再改船运东莞、太平而至香港等 3 条。走私货品多为农产品(包括桐油、茶叶、黄豆、水果、花生等)及银币、银条、锡、钨等。^②

抗战初期, 日本对香港的贸易曾受到很大抑制。但 1939 年, 中国沦陷区日资工厂产品在香港贱价倾销, 特别是花布、火柴等日货充斥市面, 使英美产品大受打击。^③ 翌年, 日本独霸中国航运, 排挤英美轮船运输。华中华南被日军封锁, 输入香港货源大减, 欧美来货亦短缺, 日货更乘机大量运港倾销,^④ 这些都是以走私为主的。

(作者张晓辉, 1953 年生, 广东省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李仲明)

① 《华南要闻》, 载 1939 年 12 月 25 日《星岛日报》。

② 程浩主编:《广州港史(近代部分)》, 海洋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71 页。

③ 《港闻》, 载 1939 年 7 月 10 日《星岛日报》。

④ 《百年商业》, 载汇丰银行编同名书, 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 1941 年版。